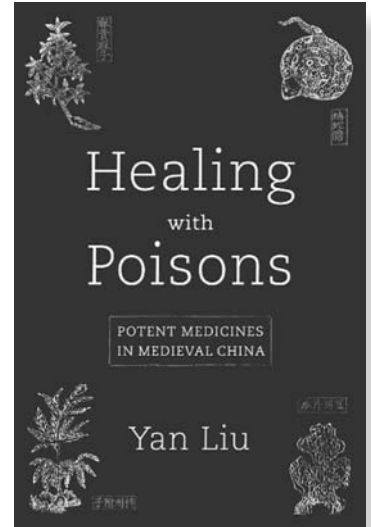


Healing with Poisons: Potent Medicines in Medieval China

Yan Liu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288 pages, ISBN 978-029-5748-99-3



談毒色變是現代人的慣性，卻非古人的通識。在孫思邈那裡，世間萬物皆可入藥，而且其中大部分屬於有毒之物。中醫藥學有其悠久歷史，不乏溫和的療癒方法，比如藥膳。但以毒治病這一不可忽視的中醫特色鮮有專門研究。在中醫手裡，諸如附子、丹砂、雌黃等「毒藥」可以帶來救死扶傷的妙用。本書作者劉焱為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書中提到一個有趣的對比，在古希臘，罌粟和鐵杉等也被用以醫療，可是一世紀後，它們被認定為絕對毒物而被移出藥物的範疇。古代中國從未出現這種概念，藥之所以能成藥，恰在於它有毒。正是毒藥與救藥之間存在的張力，讓作者花了十年精力寫作本書。

現有研究通常認為中藥史的發展歷經三個關鍵階段：漢代的理論結晶期（公元前 206-220 年）、宋代醫學理論和醫藥實踐的整合期（960-1279）、19 和 20 世紀面對現代病理學挑戰時出現的新生期。對於漢代的研究集中在《黃帝內經》，探究中藥理論的起源。大量研究更集中在宋代中醫理論的轉型，關注當時出現的新理論，印刷技術促成的醫書暴增和官方建立並頒布的醫事法律，知識階層對醫藥的興趣等等。然而，自漢至宋這段時間卻很少得到英語學界重視，本書正試圖填補這一空缺。

本書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按照時間順序排列，關注毒藥何以用於治病救人。漢代之後，五和七世紀是最值得關注的兩個時期。第一部分涉及從漢代到隋唐統一以前的中醫藥學奠基時期，雖然中藥理論發源於漢代，但直到五世紀時才真正成型。此時的醫生

和藥師依靠古代經典，開始對藥物進行系統化的分類，

明確每種藥材的毒性以及製取和應用藥品的方法。中藥研究的發展還促成了藥師職業的專門化。作者強調毒藥在藥學中的突出地位，「毒」具有悖論的意涵，它不一定指足以致命的負面效應，在特定情況下可以成為藥物。在第二章中，作者探究了能實現這種轉化的種種技術。第二部分考察七世紀時中醫藥學的發展轉變。隋唐統一後，官方建立了專門機構並編訂權威醫典以管理毒藥的應用，促成醫藥知識的標準化。統治階層對用毒和巫術高度關心，國家主導對製藥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而文人士大夫們則對這些知識的傳播有著重要影響。一方面在職務閒暇之餘，他們對這些關乎休養生息的知識興趣濃厚，另一方面，對於政治失意的官員來說，討論醫藥則提供他們委婉表達政治意見的方式。第三部分以漢末到宋代為時間跨度，討論毒藥如何用於養生。毒藥不僅僅能治療疾病，在中古文人的心中，它們具有照亮心靈和延年益壽的非凡力量。譬如五石散和煉服丹藥，被認為可以改善軀體乃至不死長生。論者常常觀察到中醫中存在不少宗教元素，但是作者指出這種說法意義不大。中古中國和前現代歐洲一樣，醫療總是與宗教、巫術以及身體認知息息相關，指向人們的宇宙觀。透視「毒藥」這扇窗口，我們可以從物質層面窺見古人的心靈世界。

本書應當劃入物質文化史的範疇。書中提到，八至 12 世紀的中國常被冠以「唐宋變革」。本書雖然沒有直

接切入對唐宋變革的討論，但作者仍留意將中藥學的研究置入政治史脈絡中考察。國家權力和官僚結構的變化不可忽視地影響了社會空間，使得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產生變化。在中藥史研究中，這直接影響到醫藥典籍等史料的呈現。宋代之前，本草和方書是最重要的兩種中醫著述類型。本草記載藥材的產地、型態、用法和其他分類的細節，附帶評註的傳統，因而能體現編定正

典的心態，與建立權威和秩序息息相關。方書則是藥方的集子，更多體現與醫療實踐相關的經驗知識生產。經歷唐末的政治動盪後，宋朝的建立掀起新一輪對醫藥知識進行的標準化。正是在此背景中，官修醫藥正典與地方醫療實踐之間存在的相互作用，以及知識精英在不同歷史時期對醫藥知識的接受和討論才變得有跡可循。

（莫澤決，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生）

The Peking Gazet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te News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Emily Mokro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246 pages, ISBN 978-029-5748-79-5

本書作者墨安男（Emily Mokros）係美國肯塔基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本書主題是清朝傳播官方消息的一種特殊刊物《京報》。為了鞏固政治權威，清廷致力於傳播《京報》，而《京報》的讀者也因此瞭解帝國如何運作。不過，這種公開的政治溝通是有限度的，例如正在進行、尚未議決的案件是無法在《京報》上呈現出來的。由於政治新聞的公開性和讀者公眾的制衡，官僚精英必須按照規則行事，這有利於清廷控制官僚機構，維護體制內部和地方社會之秩序和紀律。《京報》讀者從官員擴展到半官方、非官方之人，提高了人們對帝國議程、政權治理的瞭解，民眾的政治意識亦得以增強。

除了導論與結論之外，本書共分為六章。導論部分，作者從翁同龢的夢入手，解釋《京報》（也通常稱

為邸鈔、邸報）的概念、歷史源流、

產生過程、版面形態、讀者類型及其保存情況。清初朝廷恢復《京報》以協助重組官僚機構，並獲得官員和精英的支持。晚清知識份子和政治家將《京報》重新定義為國家合法性的象徵和公共教育的工具，以此重塑清廷權威。

第一章主要論述清朝的信息秩序。每一個新的檔案管道和制度出現，都涉及對保密和透明的政治價值之權衡。從清初出版《京報》以供官方使用，到18世紀中期，清廷已經形成一套以《京報》形式製作、管理和傳播公共檔案的穩定系統。第二章論述這種信息秩序所面臨的挑戰。在形成初期，秘密使用與公開政策是相互交織亦相互衝突的。清廷廣泛利用宣傳，促使精英和大眾都認

